

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 理论述评与经验分析

邓力平 林 峰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的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领域探讨的重要课题。基于开放经济下的国际财政观,首先对目前主流研究从理论上进行拓展,进而利用 21 个 OECD 国家 1970—2012 年的数据,借助 PVAR 模型对该拓展性思路进行经验探索。研究表明,贸易开放度对财政支出的冲击效应具有显著影响。对于贸易开放度较高的国家,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基本不会产生影响;而对于贸易开放度较低的国家,财政支出冲击会导致贸易收支的恶化和贸易失衡的加剧,其效应与总体样本类似,均呈现“双重赤字”的现象。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并为我国财政政策的运用提出一些政策启示。

【关键词】 财政支出;贸易平衡;贸易开放度

【中图分类号】F8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10(2013)06—0017—07

2009 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对国际实体经济的冲击,使得扩张性财政政策再次走到各国宏观政策运作的前台。长期的扩支出与高赤字在加重各国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可能透支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因此当前各国政府普遍将财政整顿作为后危机时代政策调控的重点。财政整顿是目前各国实现国内经济平衡的必要措施,而全球贸易平衡则是各国经济平衡发展的外部条件。基于这一背景,研究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政策—贸易政策联动,探讨全球化进程中的贸易性因素对财政—贸易政策协调运作的影响,有其实践意义。

本文拟从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结合的角度分析开放经济下财政支出冲击对贸易平衡的动态影响,力图通过比较具有不同贸易开放度的国家间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速度、强度与时效,为国际财政—贸易政策的联动性研究提供理论与现实层面的依据,也为我国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国际协调方面的启示。本文拟先对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关系研究的主流理论进行综述分析,结合开放经济现实条件

与国际财政观对主流理论做必要的拓展,进而运用一个可量化的分析框架,对该拓展性思路进行经验分析,最后根据理论分析与计量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理论述评:主流研究综述与思路拓展

(一)主流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理论界关于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关系研究的脉络体系与逻辑范式。长期以来,国外学者对于两者关系存在较大分歧,但其中,较典型且具有影响力的研究可以归为两类:一是对“双重赤字”(Twin Deficit)理论的检验。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理论预期,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了社会总需求,将推动本国实际汇率升值,从而导致经常账户恶化。较多学者对财政账户与经常账户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导致经常账户恶化,即存在“双重赤字”(Dibooglu, 1997; Monacelli 和 Perotti, 2010)。二是随着代际交叠模型被引入经常账户的分析框架,一些学者从理性预期的角度提出了“李嘉图等价”

【作者简介】邓力平(1954—),男,福建沙县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财政税收、宏观经济。

假说。他们认为,居民的跨期选择行为抵消了财政政策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政府为赤字筹资的任何举措都不会影响国内消费和投资,从而财政政策对经常账户不存在显著影响。虽然多数学者对这一假说的前提条件及合理性存有质疑(Jappelli, 1990; Seater, 1993),但也有少数学者运用数理模型对此假说予以了论证,认为两者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Erceg等, 2005)。

在经验分析方面, Favero (2002) 将财政冲击作为财税制度估计量的残差应用到经验研究中,并运用向量自回归方法(VAR)刻画了财政冲击对经济系统的影响机制。其后不少学者也选择了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VAR模型,通过适当的结构化处理,探讨财政冲击对外部均衡的动态效应。例如, Kim 和 Roubini (2008) 研究了浮动汇率制下美国财政冲击对经常账户与实际汇率的影响。Corsetti 和 Müller (2006) 采用结构性的SVAR方法考察了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财政平衡与贸易平衡的互动关系。Giuliodori 和 Beetsma (2005) 同样利用SVAR模型分析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财政冲击对本国进口的作用机制。部分学者也试图通过另外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经验探索。例如,齐红倩和耿鹏(2012)采用面板门槛模型估计出42个发达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财政政策对经常账户的影响程度。Jacob 和 Peersman (2013) 通过构建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以“李嘉图等价”假说作为前提条件探讨了决定贸易平衡的关键性因素。Beetsma等(2006)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考察了财政冲击对价格水平、实际汇率等经济指标的影响,但其模型构架并未考虑对外部均衡的检验。

(二)拓展性思路的提出

从对目前主流研究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出,对于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关系的现有研究可能存在两个局限性。一是在理论研究方面,主流理论大都侧重于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影响性研究,而对影响因素的探讨相对不够。特别是基于开放经济的现实条件,对各国财政—贸易政策的联动性研究显得相对薄弱。二是在经验分析方面,现有研究主要是对财政政策主权运用与贸易平衡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评估与测度,但对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国际协调的讨

论相对较为不足。

本文基于开放经济下的国际财政观,提出应对主流研究较少涉及的上述问题进行理性审视。传统意义上说,对国际财政理念的把握是从世界或全球的角度来看待主权国家间的财政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这一理念主要体现为对财政政策主权运用与国际协调辩证关系的把握。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各国财政—贸易政策的联动性特征也愈发明显,笔者提出两点拓展性思路。

其一,应基于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间经济相互联系与依存的现实特征,探讨各国财政政策主权运用与贸易平衡的关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研究各国财政—贸易政策的联动性,就是要从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等现实角度对国际财政问题进行挖掘。本文将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的关系研究融入贸易开放等现实条件中,并借助后文中的经验分析,力图证实贸易开放度对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关系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支持了主流研究中的“双重赤字”理论,而且通过引入贸易开放度对以往研究中较少涉及的“李嘉图等价”假说也予以了初步论证。

其二,在开放经济下把握全球化进程中各国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国际协调的发展动向,并为我国财政政策的可持续运用提供启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研究各国财政—贸易政策的联动性,能够为财政—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开辟新的思路,进而为我国财政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协调发展提供一个必要的国际视角。本文将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开放经济下财政—贸易政策国际协调的发展趋势,从而为我国运用财政政策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二、经验分析: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与变量说明

基于上述回顾与判断,本文采用一个能兼顾主流研究与拓展性思路的分析框架,即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从两方面考察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影响,一是沿袭主流研究的基本思路,从总体上测量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影响,验证“双重赤字”或“李嘉图等价”现象是否存在;二是基于开放经济下的国际财政观,把开放经济现实条件融合到分析框架中,以贸易开放度作为开放经济的衡量指标,比

较不同贸易开放水平的国家间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速度、强度与时效,以揭示贸易性因素对冲击效应的影响程度。

在建立 PVAR 模型前,先对变量选择、数据来源等做三点说明。

一是数据。基于样本选择的代表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共选取 21 个 OECD 国家 1970 - 2012 年的年度数据作为面板数据样本,这些国家分别为: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西班牙、芬兰、法国、英国、希腊、爱尔兰、冰岛、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挪威、新西兰、葡萄牙、瑞典和美国。由于数据缺失严重,发展中国家未列入本文的研究样本。尽管如此,考虑到 2009 年国家金融危机后,美国财政赤字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频发,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规模与增长速度大幅高于其他类型国家,故选择 OECD 国家作为研究样本仍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对于 OECD 国家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 OECD Economic Outlook (EO) 数据库和 OECD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MEI) 数据库,以 2000 年作为基期,并对所有数据(除相对指标外)取自然对数。

二是 PVAR 模型中内生变量的选择。本文将财政支出、产出水平、实际有效汇率和贸易平衡作为 PVAR 的内生变量,从总体上评估并考察财政支出对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作用机制。

财政支出(G):在已有研究中,关于财政支出的测度大都选择相对指标(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例),这种设定往往忽略了 GDP 对财政支出“自动稳定器”的反应,因此本文采用财政支出的绝对量作为主要衡量指标。财政支出指的是财政消费性支出与投资性支出的结构性加总,消费性支出与投资性支出分别用各自的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其中,希腊的消费性支出存在数据缺失,采用政府工资消费支出与政府非工资消费支出之和替代;意大利和西班牙投资性支出的平减指数存在缺失,以两国的总投资支出指数替代。

产出水平(GDP):一般宏观理论都对财政支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予以肯定。事实上,主流理论坚持认为财政支出对外部均衡的调节机制取决于内部经济指标的变化轨迹。本文选用 GDP 平减指数调整过后的实际产出水平,以衡量财政支出的经济

效应对贸易平衡可能存在的影响机制。

实际有效汇率(REER):通常意义上,实际有效汇率在长期往往被认为更真实地反映出一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和在国际贸易中的实际竞争力,且其权重构造也是基于对多边贸易流量的考察,这符合本文对贸易平衡的研究落点,故选用实际有效汇率作为传统研究中实际汇率的替代变量。

贸易平衡(TB):采用贸易收支数据替代传统的经常账户数据,以贸易收支差额(净出口额)占 GDP 的比例表示贸易平衡。进口额与出口额分别用各年度进口指数和出口指数进行平减。

三是如何利用贸易开放度对总体样本进行区分。关于贸易开放度差异对财政支出冲击的影响,Corsetti 和 Müller(2006)已有涉及,但其研究有三局限性:一是仅选用进口依存度作为衡量指标;二是样本只包含四个国家,主要是以美国作为差异性的分析主体;三是未明确区分样本的方法。本文采用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例来表示贸易开放度,并依据中位数标准^①,将 21 个 OECD 国家区分为贸易开放度较高的国家与贸易开放度较低的国家。其中,贸易开放度较高的国家(10 个)为:奥地利、比利时、丹麦、爱尔兰、冰岛、韩国、荷兰、挪威、葡萄牙和瑞典;贸易开放度较低的国家(11 个)为: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希腊、意大利、日本、新西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

(二)基本模型的设定

为揭示财政支出冲击对贸易平衡影响的动态效应,本文采用 PVAR 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脉冲响应分析。这种估计方法较能有效地把握变量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也有助于克服个体异质性带来的估计偏差。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y_{it} = \beta_0 + \sum_{j=1}^p \beta_j y_{i,t-j} + f_i + d_t + \varepsilon_{it}$$

上式中, $y_{it} = (G_{it}, GDP_{it}, REER_{it}, TB_{it})^T$ 是包含四个内生变量的列向量, i 代表样本国, t 代表年份, p 代表滞后阶数。 β_0 表示截距项向量, β_j 则表示滞后变量的参数矩阵。 f_i 是 4×1 维的个体效应向量, d_t 是 4×1 维的时间效应向量, ε_{it} 则代表“白噪音”扰动项。

由于 PVAR 模型采用传统的 Cholesky 分解,其

结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生变量的排序。本文在 Beetsma 等(2006) 的设定基础上加入外部均衡变量,对于内生变量的顺序设定依次为 G、GDP、REER 和 TB,即假定财政支出对产出、实际有效汇率和贸易平衡的冲击没有同期响应,产出对实际有效汇率和贸易平衡的冲击没有同期响应,而实际有效汇率数对贸易平衡的冲击没有同期响应。

在估计系统参数和脉冲响应函数前,分别采取均值差分 (Mean – differencing) 与前向均值差分 (Forward Mean – differencing) 去除时间效应 d_i 和个体效应 f_i 。在参数估计过程中,以全部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 (SYS – GMM) 对模型参数进行有效估计。在脉冲响应的分析过程中,则采用 Monte – Carlo 模拟获得正交化脉冲响应函数的置信区间,并估计出最终的脉冲响应函数。

(三) PVAR 模型估计

在对 PVAR 模型进行估计前,需要对变量 G、GDP、REER 和 TB 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平稳性。为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采用 IPS 检验、LLC 检验和 PP – Fisher 检验分别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所示,各变量的水平值均存在单位根,而对其一阶差分值进行检验时,发现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均表现为无单位根的平稳序列,因此采用 PVAR 分析不存在伪回归。

根据 AIC 与 BIC 准则,最终选定滞后阶数为 2 的 PVAR 模型。作为分析的第一步,首先对 21 个 OECD 国家组成的总体样本进行 PVAR 估计(如表 1 所示),可以得出五个基本特征。其一,财政支出对产出存在显著的影响,但不同滞后期的经济效应也具有较大差异性,滞后一期时的经济效应为正,而滞后两期时却转为负。其二,产出水平对实际有效汇率存在较强的负向影响,表明经济增长将加速实际有效汇率贬值。其三,实际有效汇率对财政支出和产出基本不会产生影响,但对贸易平衡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四,产出水平对贸易平衡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存在影响路径的不一致,滞后一期时影响为负,滞后两期时影响为正。其五,财政支出对实际有效汇率和贸易平衡均未产生显著性影响,即财政支出对外部均衡缺乏直接作用机制。可以认为,PVAR

模型中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表现为较弱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两方面因素。一方面,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调节主要还是源于内部经济效应所发挥的传导机制。一是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可以直接影响贸易平衡,财政支出通过对内部需求,即产出的作用机制能够直接影响外部需求和贸易平衡;二是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通过汇率机制可以间接影响贸易平衡,财政支出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将导致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最终转化为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弱化作用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如前所述,通过引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贸易开放因素,不同贸易开放度国家的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作用机制,进而导致总体样本的 PVAR 分析效果的弱化。

表 1 总体样本的 PVAR 估计结果				
变量	G _{it}	GDP _{it}	REER _{it}	TB _{it}
G _{it-1}	1.071 *** (0.118)	0.205 ** (0.098)	0.283 (0.207)	-0.020 (0.055)
G _{it-2}	-0.139 ** (0.073)	-0.099 * (0.054)	-0.156 (0.108)	0.010 (0.033)
GDP _{it-1}	0.093 (0.079)	1.223 *** (0.085)	0.137 (0.152)	-0.141 *** (0.046)
GDP _{it-2}	-0.070 (0.081)	-0.358 *** (0.071)	-0.235 ** (0.115)	0.142 *** (0.040)
REER _{it-1}	-0.005 (0.051)	-0.066 (0.053)	1.067 *** (0.118)	-0.063 ** (0.031)
REER _{it-2}	-0.032 (0.022)	-0.007 (0.025)	-0.254 *** (0.056)	0.049 *** (0.015)
TB _{it-1}	-0.279 ** (0.143)	0.250 * (0.149)	0.257 (0.233)	0.976 *** (0.092)
TB _{it-2}	0.241 *** (0.082)	0.038 (0.098)	-0.079 (0.179)	-0.037 (0.077)

注:括号中的值为标准差,其中 * * *、* * 和 * 分别表示通过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四) 脉冲响应分析

由于 PVAR 模型具有非理论性,从参数的估计结果判断变量间的动态关系可能过于简单化。因此,对于总体样本的分析和两类贸易开放度国家的对比,还是需要借助脉冲响应函数方法 (IRF) 对不同变量间的互动关系做进一步判断。将冲击作用的期限设置为 10 期,通过 1000 次随机模拟可以得到各变量对财政支出的脉冲响应函数图(见图 1)。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将重点分析贸易平衡对财政支出冲击的动态响应。

1. 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效应

总体样本的脉冲响应图显示,来自财政支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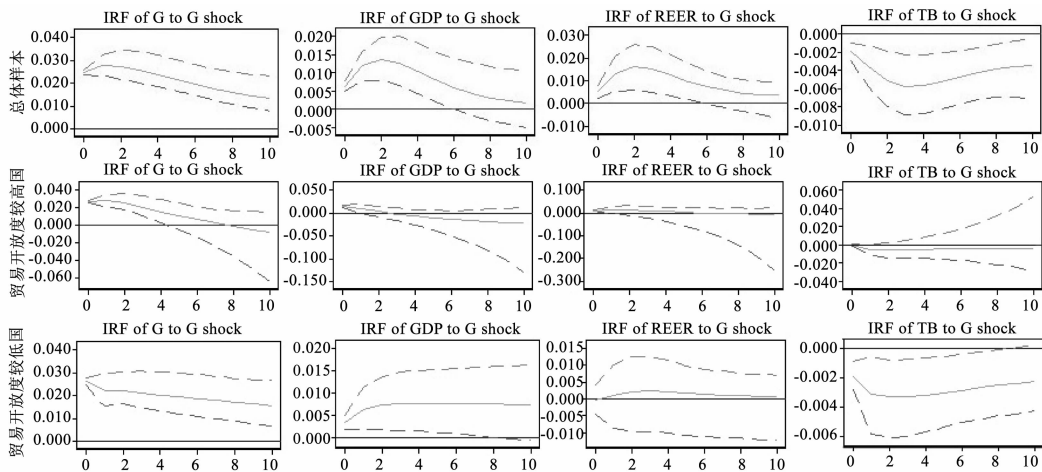


图1 各变量对财政支出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一个正交化冲击,会引起产出和实际有效汇率的正面响应,均在第3期增加到最高点后逐渐衰减,到第10期时趋向于零,表明OECD国家的财政支出对产出和实际有效汇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也与传统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理论预期相吻合。

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效应则呈现“U型”的变化轨迹。一单位的财政支出冲击,会造成贸易平衡量在第1期下降0.36%。从第2期开始,贸易失衡的状况逐步加剧,在滞后3期时下降到最低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阻碍作用逐渐减弱,以较为平缓的速度向稳态收敛。以上特征表明,财政支出冲击对于贸易平衡存在持久性的阻碍作用,进一步体现了OECD国家所面临的“双重赤字”困境。

2. 贸易开放度对冲击效应的影响

对于贸易开放度较高的国家,财政支出冲击对产出和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十分有限,均在第1期达到响应峰值之后便快速回落至零值。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效应也非常微弱,财政支出冲击伊始只造成贸易平衡量下降0.06%。随着滞后期数的增加,会发现零值线始终位于5%和95%的置信区间内,这表明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基本不会产生影响,此时“李嘉图等价”假说成立。

对于贸易开放度较低的国家,尽管财政支出冲击对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仍不显著,但对产出表现为强劲的推动作用,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推动作用呈持续扩大的趋势。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效应与总体样本的路径较为相似,都呈现“先降后升”

的变化趋势。但与总体样本不同的是,尽管其贸易平衡的响应强度较弱,但响应速度更快,持续时效也更长。从图中可以看出,其响应峰值在第2期就已达到,其后在最低点停留了约5期后才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向稳态趋近。这表明在贸易开放度较低的国家,贸易收支对财政支出的冲击响应更加敏感,时效也更加持久。

由此可见,贸易开放度的不同会造成冲击效应产生明显差异。冲击效应的差异性可能与财政政策在不同贸易开放水平下的外溢性特点有关。一国财政政策的主权运用会对另一国产生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可能来自税收、贸易、投资等多方面因素,而贸易层面的外溢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开放的水平(Corsetti等,2007)。对于贸易开放度较高的国家,财政支出冲击可能对他国产生更为显著的贸易外溢性,这种跨境的外溢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抵消了冲击对本国贸易收支的直接影响,从而导致“李嘉图等价”假说成立。而对于贸易开放度较低的国家,由于外溢效应发挥的空间有限,财政支出冲击对贸易收支的直接效应更易显现,进而造成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之间存在较强的动态联系。

(五) 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分析可以从贡献率的角度,与脉冲响应分析形成互补。表2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贡献率正在不断加大,由第1期的1.5%增加至第10期的11.3%,到第20期达到12.8%的贡献率,这表明长期来看,财政支出的变动对贸易平衡变动的解释效力在逐步强化。

贸易开放水平的差异性也决定了方差分解效应的强度。在贸易开放度较低的国家,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贡献率始终高于贸易开放度较高的国家,表明对外开放水平越高,财政支出冲击对贸易平衡的作用机制更易显现,这也与上文脉冲响应分析的结论相一致。

表 2 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贡献率的方差分解结果

样本 期数	总体样本 (21 个国家)	贸易开放度较高 (10 个国家)	贸易开放度较低 (11 个国家)
1	0.015	0.001	0.025
2	0.028	0.035	0.044
3	0.047	0.049	0.055
4	0.066	0.057	0.064
5	0.080	0.062	0.072
10	0.113	0.081	0.100
20	0.128	0.103	0.119

三、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开放经济下的国际财政观,提出了对目前主流研究进一步拓展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将各国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的联动性研究融入开放经济的现实条件中;二是如何从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国际协调的视角为我国财政政策的可持续运用服务。对于第一个问题,本文力图通过经验分析来对此做出解答,主要借助 PVAR 模型从总体上考察了 21 个 OECD 国家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效应,同时将贸易开放水平作为开放经济下的重要条件,测度了贸易开放度对冲击效应的影响程度,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一是总体上看,财政支出冲击对于贸易平衡存在持久性的阻碍作用。长期内,财政支出冲击将推动产出提高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从而加剧贸易失衡的状况,这也进一步支持了“双重赤字”理论。二是不同贸易开放度国家的冲击效应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贸易开放度较高的国家,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基本不会产生影响,此时“李嘉图等价”假说成立;而对于贸易开放度较低的国家,财政支出的冲击效应与总体样本的路径较为相似,表现为贸易收支的恶化与贸易失衡的加剧,但与总体样本不同的是,其冲击效应的速度更快,时效也更加持久。

本文提出的拓展性思路实质上是依次递进的两个方面,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把握也为第二个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基础。从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结论出发,可以对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我国财政政

策的运用、财政—贸易政策的联动至少提供三点政策启示。

其一,在把握财政政策主权运用与贸易平衡关系的基础上,应理性审视财政—贸易政策国际协调的发展路径。本文的研究启示我们,在各国经济高度依赖的今天,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过度长期运用会对维持贸易平衡具有不利影响。从经济发展长远来看,实行审慎的宏观财政政策是确保贸易平衡的必要条件。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趋缓、对外出口增长下滑的不利条件,需要理性权衡国际财政政策运用的强度、效益与时间跨度,要积极推动财政—贸易政策国际协调的步伐。既要通过财政政策的国际协调继续保持本国财政运作的有效性,又要通过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尽可能地降低对外部均衡的影响,努力实现财政与贸易政策的有效协同与稳健运用。

其二,在把握开放经济的现实特点与立足国情的前提下,应客观地看待不同国家参与财政—贸易政策国际协调的侧重点。本文经验分析的结论启示我们,在积极倡导财政—贸易政策国际协调的同时,应考虑不同贸易开放水平的国情特点,从各自的国情出发有所侧重地参与财政—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对于贸易开放度较高的国家,由于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缺乏作用机制,应着重加强对财政政策国际协调的倾斜,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外溢性对本国贸易平衡的扭曲效应。而对于贸易开放度较低的国家,更应注重财政—贸易政策的联动性机制,积极参与财政与贸易两类政策的国际协调。在国际协调的约束下,适当调节刺激政策的力度与重点,尽量弱化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阻碍作用。同时,应继续深化贸易开放进程,通过国家间的财经合作来维持本国的贸易平衡。

其三,在把握统筹国内外发展两个大局的基础上,要辩证地看待我国财政政策主权运用与国际协调的关系。要在妥善处理好国内财政发展各种关系的同时,努力研究涉外财政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联动性。一方面,我国作为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要注重贸易开放水平对财政政策主权运用效力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贸易开放度已在逐步提高。结合本文对贸易开放度较高国家的经验探讨,可以认为,随着我国贸易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应积极推进

对财政政策与贸易政策国际协调的参与进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尽量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外溢性对贸易平衡的扭曲效应,努力探索我国财政政策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而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参与财政—贸易政策国际协调的过程中还要体现国情特点。发达国家因长期面临着贸易失衡的压力,因此更加重视对财政—贸易政策国际协调的参与力度和范围。而我国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仍将持续贸易顺差的走向,贸易收支呈现出平衡发展的态势。因此我们需要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参与财政—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在积极参与两个政策国际协调的同时,应更多地借助财政政策的国际协调加强我国财政运作的可持续性,同时通过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来防范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

必须看到,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也就有了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一是引入贸易开放度作为开放性条件的衡量指标虽然是本文的特色,但仍有必要选取其他代表性指标来更全面地衡量开放经济条件,进而揭示不同衡量指标对冲击效应的影响程度。二是尚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途径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到本文的研究样本中,纵向考察不同发展水平条件下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影响显然更具有现实性意义。对于这些问题,笔者都愿意与理论界同仁一起继续深入研究。

【注】

①参照 Love 和 Zicchino (2006) 在 PVAR 模型中对中位数的设定标准。首先测算每一个国家贸易开放度的中位数,其次测算全部国家贸易开放度的中位数,若前者高于后者,则将该国归类于高贸易开放度国家;反之,则归类于低贸易开放度国家。此处的高低只是相对概念。

参考文献:

[1] 邓力平. 税收发展与税制改革:我国加入 WTO 十年的思考 [M]. 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2012.

[2] 邓力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四位一体”的分析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3] 齐红倩, 耿鹏. 财政赤字、经常账户与政府债务研

究——李嘉图等价视角的国际经验分析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2, (12): 46 - 51.

[4] Beetsma R, Giuliodori M and Klaassen F. Trade spill - overs of fiscal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a panel analysis [J]. Economic Policy, 2006, 21(48): 639 - 687.

[5] Corsetti G and Müller G. J. Twin deficits: squaring theory, evidence and common sense [J]. Economic Policy, 2006, 21(48): 597 - 638.

[6] Corsetti G, Meier A and Müller G. J.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fiscal policy transmission [R]. Working Paper, EUI, 2007.

[7] Dibooglu S. Accounting for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Applied Economics, 1997, 29(6): 787 - 793.

[8] Erceg CJ, Guerrieri L and Gust C. Expansionary fiscal shocks and the US trade deficit [J].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05, 8(3): 363 - 397.

[9] Favero C. How do European monetary and fiscal authorities behave? [R].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3426, 2002.

[10] Giuliodori M and Beetsma R. What are the trade spill - overs from fiscal shocks in Europe?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De Economist, 2005, 153(2): 167 - 197.

[11] Jacob P and Peersman G. Dissecting the dynamics of the US trade balance in an estimated equilibrium model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3, 90(2): 302 - 315.

[12] Jappelli T. Who is credit constrained in the US economy?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0, 105(1): 219 - 234.

[13] Love I. and Zicchino 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dynamic investmen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panel VAR [J].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6, 46(2): 190 - 210.

[14] Monacelli T. and Perotti R. Fiscal policy,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traded goods [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0, 120(544): 437 - 461.

[15] Seater, J. J. Ricardian equivalence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3, 31(1): 142 - 190.

(责任编辑:韩 斌)